

新疆

屯
垦

Xinjiang Tunken yu
Wenhua Yanjiu Luncong

与文化研究论丛
2007

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编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论丛

2007

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 编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论丛. 2007/石河子大学新疆屯
垦与文化研究院编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109-12863-7

I. 新… II. 石… III. ①屯垦—农业史—研究—新疆
②文化史—研究—新疆 IV. F329.45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219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赵 刚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论丛 2007》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周生贵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宗磊 石 岚 刘贡南

齐清顺 李 赋 张安军

宋晓梅 贾丛江 郭 宁

薛 洁

序

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 9 月，是石河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院成立之后，在研究人员的辛勤耕耘和通力合作下，科研工作日趋深入，新论不断，新见迭现，新人辈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展示研究院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便于对外交流与合作，研究院计划编辑出版《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论丛》，每年一卷。本卷即为研究院研究人员和院外学者 2007 年科研成果的汇总。

《论丛》以新疆历代屯垦、西域民族历史文化和中亚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重点对历代屯垦制度、兵团屯垦史、新疆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以及中亚政治、民族及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从学科来讲不仅涉及到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而且还涉及到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因此，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虽然是对新疆古今屯垦、西域民族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但其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分重要。

《论丛》立足石河子大学，面向新疆，广集有关新疆

历代屯垦、西域民族历史文化和中亚研究的论文以及调研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广纳百川，努力展示研究院乃至新疆有关学者在上述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总之，《论丛》的宗旨是：繁荣学术，服务现实；求真务实，不断创新。我们期待着院内外的广大学者、读者关心和支持《论丛》，并不断惠赠佳作，共同将《论丛》办好，使之能在兵团、新疆乃至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西部开发的现实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

2008年7月

目 录

序

兵团计划单列的前前后后	郭 刚 (1)
屯垦戍边文化万古长青	杨发仁 (20)
兵团文化建设三题	王翰林 (25)
新中国农垦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王小平 (47)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推进屯垦戍边事业的创新发展 ...	吴 珍 (58)
新疆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郭 宁 (66)
论兵团新型生育文化	龙开义 (80)
石河子市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王利中 (104)
新疆兵团边境团场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李 芳 (116)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兵团人口发展的 可持续性评价	刘月兰 汪学华 (124)
对兵团“银发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再思考	毕红梅 (136)
论西汉与乌孙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	董建勇 (145)
唐代农民群体的物质生活及精神世界	张安福 (154)
元代西域将领蔡公直事迹述考	王宗磊 (171)
清代学风与世风关系概说	郭院林 (183)
清代新疆玛纳斯民屯考述	何汉民 (213)
近代边疆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 ——以边疆中心观为视野	黄达远 (227)
近代我国耕地资源价值增值演变初探	张彦虎 (236)
重现辉煌的丝路文明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文化合作	石 岚 (245)
中亚与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分析	杨 筠 (257)

兵团计划单列的前前后后

郭 刚

1987年4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了我到兵团任职的任命。我深感责任重大，力难胜任。我虽在新疆工作多年，但对兵团情况基本不了解，为了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我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并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我对兵团的光辉历史，肩负的历史重任，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发展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卫国守边所做的贡献，有了初步了解。兵团恢复后领导班子克服“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造成的种种困难，领导广大干部和职工顺应历史大潮，高举改革发展大旗，对传统经营模式进行历史性的大胆改革，使兵团在各方面得到迅速恢复，并走向新的发展轨道的成就，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特别是兵团人为国献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奋进、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敬佩。我深深感到兵团的事业是神圣的，成就是辉煌的，兵团人是可敬可佩的，我能在这样的单位任职是光荣的，使我更增强了信心，认识到责任的重大。

—

通过调查研究，也使我了解到兵团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着兵团的发展，甚至威胁兵团发展前途。

（一）国家对兵团管理体制存在扭曲现象

兵团是一个工农商学兵俱全，产业门类多的超大型社会组织，归口国家农业部领导，农业部对兵团十分关怀、大力支持。但农业部是个专业部，兵团许多事业都超出了农业部职权范围，难以满足兵团多方面的需要。如工业、物资、水利建设及教育、科技、交通、卫生、军事、边防、民政、救灾等经济及社会事业都得不到国家计划财政及相关部门的应有支持。兵团同时归自治区领导，但按管理体制，自治区只管收税，统计报表，财务不在管理范围之内，要兵团自己负责。兵团新建项目却要经自治区批准，由于种种原因有时难以如愿。兵团进入市场的农副产品自己无权经营，得不到流通环节的效益，实际上成为超大型的生产车间。价格政策实行双轨制以后，兵团农副产品完全以国家规定的计划价卖给国家，而生产这些产品的农用物资，却要以高价从市场购进，以致有些产品销售价与成本形成倒挂，导致农牧团场亏损经营，靠贷款运转，背上利息，债台越垒越高，形成恶性循环。

（二）经济发展缺乏多种所有制发展的拉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放开各种所有制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国有经济稳步前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资”企业及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七五”、“八五”期间我国 GDP 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非国有经济的拉动。但兵团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有经济基本没有，导致兵团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与全国相比明显缺失，不利于兵团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制约着兵团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央认识到这种体制不利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因而在经济体制方面不断进行改革：下放权力，搞活经济，以后又依次提出了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到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企业，调动资源合理配置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出现了万马奔腾、生机勃勃的局面。兵团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典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上对计划经济体制触动不大，一级一级捆得很死，经济搞不活，未能有效调动起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

（四）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及“三资”企业的高速发展，我国一、二、三产业比重迅速发生变化，“六五”末，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 28.4%，43.1%，28.1%，到“八五”末分别变化为 20.6%，48.4%，31%，二、三产业比重增加了 8.2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城乡二元经济发生着历史性的演变，小城镇建设迅速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付诸实践。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兵团二、三产业发展很慢。在“六五”期末，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 40.2%，39.4%，20.4%，到“八五”末，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 46.1%，26.2%，27.7%，二、三产业比重比“六五”末反而下降了 5.9 个百分点。

（五）财务在新形势下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

兵团恢复后，财务方面出现三大变化：一是国家拨款从以往预决算制度改为财务包干，每年补贴三亿多元，盈亏自负。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行政、武警、政法、监狱管理等单位人头费，

基本上没有用于生产性投入的份额。二是实行利改税后，兵团过去用于扩大再生产投入、补助行政、事业费的利润都变为税收上交国家。到 1987 年兵团上交税已达 2.21 亿元，基本上断了兵团自我发展的财源。三是职工离退休进入高峰期，兵团撤销前的 1974 年，离退休人员很少，支出也很少，到 1987 年，离退休人员已达到 21.5 万人，年支离退休费 2.35 亿元。绝大部分要兵团自负，而且支出逐年刚性增长，使兵团各级财务不堪重负，十分困难，尤其那些收入低的团场，大有难以为继之势。

以上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新问题，而且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成为经济发展中具有连环套性质的困难，严重制约着兵团经济发展，直接产生两大后果：一是经济发展必然出现滞后期。经济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没有投入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由于财务困难，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直接影响兵团经济发展速度。水利是农业命脉，国家财政每年为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农业是兵团的主体产业，水利建设却得不到国家财政应有的投资，只有一部分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只能支持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无力进行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老企业技改十分重要，但兵团由于缺乏资金许多老企业却得不到技术改造，仍然是老设备、老工艺、老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在产品短缺时期，尚能维持，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就处于困难境地，产品积压、利润下降、财务困难，靠贷款运转，债台高筑，有的资不抵债，面临破产。二是职工队伍不稳。利改税后，由于把利润变为税，上交给了国家，原来用利润支付的支出都转嫁到职工身上，职工负担越来越重，有的收不抵交，形成倒挂，劳动一年，不但无利，反而欠账。有的团场虽有利润，因财务困难，不能及时给职工分配兑现，职工欠团场，团场欠职工，形成大量债务关系，职工意见很大，导致人心不稳，人口外流。1982—1987 年，外流人口近 11 万。经济实体与人口是兵团力量的载体，经济发展慢，人口外流，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兵团屯垦戍边的

基础，威胁兵团的前途命运。

上述问题的产生，都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并非工作失误。上届班子都是老军垦；政治上强，经验丰富，他们在兵团恢复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仅保证了各方面正常运行，而且推动兵团进行了改革，经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实在是难能可贵。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上述问题未来得及全部解决，而且有些问题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八五”期间，兵团 GDP 年均增长速度低于自治区 4.1 个百分点。当然与自治区也有不可比的方面，自治区有国家投资大、发展快的石油、铁路、电力、民航、金融等，兵团都没有。但应承认，兵团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尽如人意的。

二

为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兵团党委于 1987 年 7 月召开常委会，专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兵团的改革，同时结合兵团的实际，为有利于兵团更好地发展，决定向自治区党委及农业部作一次系统汇报，争取改变国家对兵团的管理体制。1987 年 9 月 2 日兵团党委召开常委会专门就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鱼振东同志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兵团困难，只有实行计划单列。这是我来兵团后第一次听到这种建议，据说过去有人提过，上一层领导班子曾提出过要求计划单列，并做过一些工作，但未产生结果。对计划单列，我既无思想准备，又没把握，更怕影响与自治区及农业部的关系，但却受到启发，萌发了可否要求单项计划单列的想法。会上研究了向区党委、农业部汇报内容，决定向区党委写四个报告：

1. 关于尊重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加强兵地团结、合作的报告，建议师、地主要领导交叉任职参加党委领导工作。

2. 关于解决农牧团场职工城市户口，供应商品粮的报告。

3. 关于请求兵团棉花自营的报告。

4. 要求兵团啤酒花自营的报告。

向农业部写了六个报告：

1. 要求将兵团开荒列入国家计划的报告。

2. 要求解决兵团财务中几个困难的报告。

3. 要求由国家直接分配大学生的报告。

4. 要求兵团武警体制升格的报告。

5. 要求将兵团工业、物资计划在国家单列的报告。

6. 要求解决团场干部粮油肉差价补贴的报告。

报告起草后，经9月5日和10月15日两次常委会进行了讨论，一致通过。向农业部的报告，已包含了计划单列的要求，也是兵团要求计划单列的起点。

我与倪豪梅同志1987年10月23日去北京参加党的十三大。大会于11月2日结束，11月3日我与按事前约定到达北京的刘双全、章恒、鱼振东三位同志及倪豪梅同志就开始了活动。先向农业部刘江、陈耀邦两位副部长及农垦局长孙泮琪同志作了汇报，并安排了我们五人在京活动日程。11月4日，我们到国家计委向计委管农口的领导作了汇报，由于当时国务院已有了不再扩大计划单列范围的精神，因此，他对兵团要求工业、物资单列问题，未能同意，但对兵团投资体制、物资体制、建立商品粮基地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意成立兵团投资公司与国家计委六个投资公司挂钩，同意兵团建立商品粮基地，每年下拨2000万元有偿投资。11月4日晚，又一次向刘江同志作了汇报，刘江同志表示对兵团提出的报告要与有关方面研究解决。11月5日，我们到武警总部汇报，要求兵团武警升格及解决军需给养、训练、装备、通讯等问题，得到武警总部领导的支持。

11月5日下午，我们到财政部向田一农副部长作了汇报，蒋乐民司长、郭静宁处长参加了会议，我们要求延长亏损补贴期限，解决建立商品粮基地资金，他们答应研究解决。

11月6日，我们到农业部参加了一天会议。第二天，我们五人一同看望了王震同志，要求他帮助兵团解决困难，他欣然答应。

11月9日，我们到水利部向钱正英部长汇报要求解决兵团水利基本建设资金。钱正英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后说：郭刚同志您走错了门，您应该找何康，我有钱也不能给您，您可以向农业部提出项目建议，让农业部与水利部协商解决。这使我认识到不解决体制问题，兵团困难是难以解决的。

这次到北京，虽未实现预定计划，但我们第一次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了接触，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使有关部门了解了兵团的困难，农业部决定以部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请求国务院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向自治区的汇报，直到1988年2月才实现。我们要求自治区允许兵团农副产品自营，下放建设项目审批权，扩大外贸权，农工转为城市户口等。当时王恩茂同志在会上讲兵团过去对自治区做了很大贡献，兵团发展越快，对自治区的贡献就会越大，现在有了困难，要帮助解决，不解决，它就难以发展，它不发展，就不能给自治区做更大贡献。由于当时自治区也有困难，但答应，对兵团的困难会后进行研究。

1988年3月31日，我根据刘江同志电话通知到北京，当日下午，刘江同志告诉我，何康部长要听取我对兵团今后发展的意见。第二天下午，我向何部长汇报了我对调整兵团战略布局及发展问题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新疆的形势与解放初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兵团战略布局也应适应形势需要加以调整，要有三个转变：一是工作重心要南移，扩大南疆兵团的力量；二是要适当向城市转移，发展二、三产业，壮大兵团在城市的力量；三是规模要扩大，在南、北疆等地新建三个师，并将乌鲁木齐、哈密、和田三个管理局升格为师，人口逐步增加到300万人。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能营造一个让中央更加放心的边疆。关于发展问题，关

键是要国家放权、放宽政策，兵团应在国务院实行计划单列，解除制约兵团发展的各种因素。

何康部长对我的汇报表示赞同，要我和农业部的同志一同起草一个报告，以部党组名义报国务院。我按约定于4月4日到农业部与孙泮琪、胡中同志研究了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兵团要求解决的问题，由胡中同志执笔。

4月7日，在刘江同志主持下，研究了农业部向国务院报告初稿。根据刘江同志意见，进行修改，第二天与孙泮琪同志一同敲定了报告草稿，报部领导审批。

4月9日，何康、刘江两位部领导亲自到新疆驻京办事处，请在京的王恩茂、宋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阿木冬·尼牙孜、何德尔拜等领导同志共进晚餐，目的是为解决兵团困难勾通思想。餐桌上我把农业部党组向国务院报告内容作了通报，由于以农业部两位领导名义请客，气氛很好，但未展开议论，只是吹吹风。4月11日，根据部领导通知，我再次到农业部一同对农业部报告作了修改。

这次进京，我很满意，为解决兵团困难总算迈出了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此后，我曾数次向宋汉良同志反映兵团困难，要求他支持兵团计划单列。宋汉良同志表态，如国务院批准，自治区会认真贯彻。我把宋汉良同志意见，用电话告诉了孙泮琪同志。

1989年4月，刘双全同志去北京开会，又一次与孙泮琪同志向国家计委管农口的副主任作了汇报，孙泮琪同志把宋汉良同志的意见也转告了计委领导同志，但仍然未同意兵团计划单列，并明确告诉：国务院的精神是不再扩大计划单列范围，新疆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更要慎重，关系理不顺，又要跳跷跷板。

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章恒同志因公去北京，看望王震同志，提出要王老支持兵团计划单列，王老批给李鹏同志，李鹏同志批示要国务院有关部门听取章恒同志汇报，但后因故未能实现。

1989年7月16日我去看王震同志，要求王老帮助兵团解决计划单列问题，王老同意，并要我和唐玉同志（王老秘书）研究操作办法，同时把他的意见转告有关部门。唐玉同志对兵团事业十分热心，他亲自安排我向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秘书长李昌安同志作了汇报，李昌安同志对兵团困难很同情，支持兵团计划单列。随后，我又到农业部向何康部长、刘江、陈耀邦副部长，就兵团计划单列问题作了汇报，农业部几位领导全力支持，并让办公厅同志为我联系国家计委领导同志听取我的汇报。

1989年7月18日，我再次向国家计委领导汇报，提出兵团计划单列的要求，计委领导仍表示不好解决，但根据王老的批示，他同意兵团有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困难。这期间国务院已将农业部党组报告批到国家计委提出意见。很明显，计委与农业部意见有分歧，但计委对计划单列问题，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只能根据计委意见既不搞计划单列，又要解决兵团困难的原则，要我和国家计委同志一同起草国家计委向国务院的报告。7月19日，我到国家计委，与时任计委副秘书长兼综合司司长王春正同志、综合司处长李镛同志一同研究了报告内容，李镛同志执笔起草。李镛同志对兵团困难很理解，对兵团提出的要求都表示支持。报告起草出来后，发回兵团，征求在疆兵团领导意见，大家都同意。

1989年9月上旬，李镛同志携报告草稿，专程来新疆征求自治区的意见，区党委财经领导小组于9月11日进行了讨论。农业部党组及国家计委两个报告，就是国阅5号文件的前身。

1989年8月下旬，钱正英同志到兵团视察工作，我陪她到农九师视察后返回。于9月2日在石河子向她详细汇报了兵团困难，她要我送她一份文字材料。她回京后，写了一封信，并请王震、王恩茂同志署名，将兵团报告附上，上报了江泽民、李鹏同志。由于他们三人身份不同，直接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不久就由陈俊生同志直接听取了兵团汇报。

1989年11月，农业部通知兵团办公厅，指名要刘双全同志带领工作人员向陈俊生同志汇报兵团情况。同时刘江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陈俊生同志要听兵团汇报，计划单列问题，您跑的多，这次让刘双全同志来，您就不要来了。我对农业部安排表示理解。

1989年11月21日，陈俊生同志听取了刘双全同志的汇报，国家计委、财政、农业、物资、铁道、水利等部委及人民银行领导参加了会议。汇报后，陈俊生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对兵团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兵团在新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作了充分肯定，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对兵团的困难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帮助解决，以巩固和加强兵团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兵团经济的发展。会议形成了纪要，会议以农业部、国家计委两个报告为基础，形成了“关于听取新疆生产兵团工作汇报的会议纪要”。

1989年12月上旬，农业部将上述纪要草稿返回兵团征求意见，12月8日，兵团党委常委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个文件是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才形成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会议对一些地方又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上述纪要发兵团同时，也发自治区征求意见，按宋汉良同志指示，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与兵团协商。自治区参加的是黄宝璋、何德尔拜两位副主席，兵团由我和刘双全参加。虽然有些利益格局早已形成，牵扯面很大，难度也大，但由于自治区对兵团的照顾，经过协商，最终取得一致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是农副产品经营权问题。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仅兵团棉花一项由自治区经营，一年就有三个多亿元的利润进入各地州财政收入，如兵团棉花自营，地州几个亿的财政亏空无法解决。鉴于这个情况，当时决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不变。以1987年上交的农副产品为基数，继续上交，超产部分除提成20%上交自治